

思想与心理之间：政治文化的位置与接近方式

俞佳儒

摘 要 政治文化是当代政治科学的重要领域，主要研究政治事务中集体层次的非客观因素。在集体性和非客观性上，政治文化分别与政治思想、政治心理产生关联，但同时在另一方面与它们相区别。从位置上看，政治文化位于政治思想之下、政治心理之上。政治文化研究的实证主义范式从政治心理出发向上接近政治文化，而解析主义范式则从政治思想出发向下寻找政治文化。存在一种折衷范式同时从两边出发逼近政治文化，并更好地揭示了政治文化的内涵。未来，大数据、自然语言处理等技术的发展，以及对文学、影视、音乐等文本的引入，可以丰富折衷主义范式的政治文化研究。

关键词 政治文化；政治思想；政治心理；实证主义；解析主义；折衷主义

一、引言

在现代政治科学诞生以前的政治学或政治哲学学说中，文化与政治的关系就已经开始被讨论。儒家用礼仪和文化区分中华与四夷，托克维尔用“民情”解释美国民主制度的成功，就是运用文化因素来解释政治现象的尝试。而首次将政治文化（political culture）在现在政治科学的意义上使用的是加布里埃尔·阿尔蒙德（Gabriel A. Almond）。他在 1956 年发表的论文《比较政治制度》（Comparative Political System）中提出了政治科学的“政治文化”概念，^①并在 1963 年与西德尼·维巴（Sidney Verba）合著出版《公民文化》（*The Civic Culture*），进一步深化了政治文化的研究。^②

但是阿尔蒙德式的政治文化研究遭到了多方面的挑战。政治文化研究领域内部存在不同取向的政治文化研究，至今尚未达成对政治文化这一概念的共识。本文将从不同政治文化研究中对政治文化理解的公约数角度出发，探寻政治文化研究者之间的最大共识，并讨论政治文化概念与“政治理论”和“政治心理”等概

^① Gabriel A. Almond, "Comparative Political System," *The Journal of Politics*, 18(3), 1956, pp.391-409.

^② 加布里埃尔·A.阿尔蒙德、西德尼·维巴：《公民文化——五个国家的政治态度和民主制度》，张明澍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 年。

念的联系与区别。随后本文在此基础上探讨学界存在的接近政治文化的两种不同方式。最后本文将在以上讨论的基础上,提出政治文化研究未来可能的发展方式。

二、政治文化、政治理论与政治心理

1、政治文化的公约数: 主观与集体

1) 政治的非客观方面

阿尔蒙德将政治文化带入现代政治科学研究时将政治文化界定为:“政治体系中蕴含的某种特定的政治行为取向模式”。^①而在《公民文化》中,阿尔蒙德和维巴将政治文化定义为:“特定的政治取向——对于政治体系及其各个部分的态度,对于在该系统中自我角色的态度”。^②到了1978年阿尔蒙德与小G.宾厄姆·鲍威尔(G. Bingham Powell, Jr.)的《比较政治学: 体系、过程和政策》,他们依旧坚持了类似的定义,认为政治文化“是在特定时期流行的一套政治态度、信仰和感情”。^③

总而言之,阿尔蒙德等人开创的政治文化研究将政治文化定义为对政治的某种取向模式。这种取向不同于政治制度、政治行为等客观存在或发生的要素,是一种主观心理的取向。正如《公民文化》所明言的那样,他们使用的“文化”就是“对社会客体的心理取向”。^④

此后学者对于阿尔蒙德式的政治文化概念提出了批评,但仍然坚持“政治文化是政治的主观方面”这一立场。白鲁恂(Lucian W. Pye)1968年为《国际社会科学百科》撰写了“政治文化”词条,他在其中指出:“政治文化是一套态度、信仰和情感……是政治的心理和主观层面的综合表现。”^⑤此后,罗纳德·英格尔哈特(Ronald Inglehart)对全球政治文化的比较研究,也是从主观的价值观层面出发的,例如明确使用“主观幸福感”这样的概念。^⑥批评阿尔蒙德等人的实证

^① Gabriel A. Almond, “Comparative Political System,” p.396.

^② 加布里埃尔·A.阿尔蒙德、西德尼·维巴:《公民文化——五个国家的政治态度和民主制度》,第13页。

^③ 加布里埃尔·A.阿尔蒙德、小G.宾厄姆·鲍威尔:《比较政治学: 体系、过程和政策》,曹沛霖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第29页。

^④ 加布里埃尔·A.阿尔蒙德、西德尼·维巴:《公民文化——五个国家的政治态度和民主制度》,第13页。

^⑤ Lucian W. Pye, “Political Culture,” in David L. Sills, ed., *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Social Sciences* (Volume 12), New York: The Macmillan Company, 1968, p.218; Lucian W. Pye, “Culture and Political Science: Problems in the evaluation of the Concept of Political Culture,” *Social Science Quarterly*, 53, pp.285-296.

^⑥ Ronald Inglehart, “The Renaissance of Political Cultur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82(4), 1988, pp.1203-1230; 罗纳德·英格尔哈特:《现代化与后现代化——43个国家爱的文化、经济与政治变迁》,严挺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

主义范式的解析主义政治文化研究者也没有把政治文化看作纯粹客观的事物，而是主体间的（intersubjective）因素。^①

在这一点上，解析主义对于政治文化的主观性有所保留，但文化存在于主体间意味着文化超脱于个人，但同时依旧与主体有着密切联系，且与政治制度、地理环境和气候等客观要素有着本质不同。一言以蔽之，在主流的政治文化研究中，政治文化提供了对政治的非客观取向。^②这是政治文化研究中的第一个公约数。

2) 政治的集体层次

政治文化探讨政治的主观心理因素并不代表政治文化仅仅关注个体层面的现象。政治文化具有集体的性质，个人有态度、信仰和价值观，但没有文化。^③

《公民文化》所探讨的政治文化“是对于客观政治的取向模式在该国家成员中的特定分布”。^④这意味着政治文化并非探讨特定个体对于政治现象、过程和角色的主观评价，而是个体的主观评价在集体层面呈现的集中模式。事实上，“分布”

（distribution）本身就是结构取向的研究热衷使用的术语。在此后英格尔哈特等人进行的政治文化比较研究中，同样是通过调查的方式对价值观的分布进行探讨。这种取向接近于实证主义的研究范式。可以认为，阿尔蒙德式的政治文化虽然从个体层面的取向出发，但最终关注的是集体层面的分布。

因此，阿尔蒙德式政治文化研究的反对者并不是批评政治文化停留在个体主义，而是认为个层次因素的集合无法反映集体层次的现象。例如，批评者认为公民文化研究将集体层面的文化看作个体层次的态度集合，可能犯下了“个体化谬误”。^⑤

反对者们倾向于直接从集体层次对政治文化进行考察，这样的研究接近于解

^① Marc Howard Ross, "Culture in Comparative Political Analysis," in Mark Irving Lichbach and Alan S. Zuckerman, eds., *Comparative Politics: Rationality, Culture and Structure* (2nd edi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9, p.134.

^② Sidney Verba, "Conclusion," in Lucian W. Pye and Sidney Verba, eds., *Political Culture and Political Development*,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5, p.513; 王沪宁：《比较政治分析》，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159页；佟德志主编：《比较政治文化导论——民主多样性的理论思考》，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年，第4页。

^③ David J. Elkins and Richard E.B. Simeon, "A Cause in Search of Its Effects, or What Does Political Culture Explain?," *Comparative Politics*, 11(2), 1979, pp.127-145.

^④ 加布里埃尔·A.阿尔蒙德、西德尼·维巴：《公民文化——五个国家的政治态度和民主制度》，第14页。

^⑤ Erwin K. Scheuch, "Social Context and Individual Behavior," in Mattei Dogan and Stein Rokkan, eds., *Quantitative Ecological Analysis in the Social Sciences*, Cambridge: M.I.T. Press, 1969, p.138, quoted in Arend Lijphart, "The Structure of Inference," in Gabriel A. Almond and Sidney Verba, eds., *The Civic Culture Revisited*, Boston and Toronto: 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1980; William M. Reisinger, "The Renaissance of a Rubric: Political Culture as a Concept and Theory,"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ublic Opinion Research*, 7(4), 1995, pp.328-352.

析主义范式。例如罗德明 (Lowell Dittmer) 认为, 政治文化是一种政治符号系统 (semiological system), 而不是个体态度的集合。^①史天健和辛道辙等则通过社会中的文化规范来探讨政治文化。^②胡鹏同样在解析主义范式的基础上提出政治文化的新定义: “被普遍接受的有关人类群体秩序和权力关系安排的意义系统”。^③这些学者在政治文化的主观性上或许有些保留, 但在政治文化的集体性上是一致的, 甚至解析主义者更加重视政治文化的集体性。

总之, 不同的政治文化研究者都认为政治文化是一个集体层次的变量, 他们之间的分歧在于如何获得对集体层次变量的理解。这是政治文化研究中的第二个公约数。

2、作为中间层次的政治文化

通过上述讨论可以看到, 政治文化探讨的是集体层面的主观因素。它一方面与作为客观现象的政治制度与政治行为相区分, 另一方面也不同于个体层面的观念和态度。^④这两个最大公约数也使得政治文化区别于政治心理与政治思想。^⑤

1) 政治心理与政治文化

政治文化在“个体-集体”的层次上区别于政治心理。政治心理学研究包括个体心理对政治行为的影响, 这被政治心理学称作性情论 (dispositionism)。^⑥例如, 政治心理学关注人格如何影响政治行为,^⑦这在政治心理学发展的早期阶段尤为突出。^⑧此外, 政治心理学还关注个体心理对投票行为、政治态度的影响、政治心理对政治决策的影响等。因而关注集体层次的政治文化不能与关注个体层次的政治心理划上等号。公民文化式的政治文化认为, 个体层次的政治心理聚集成模式反映了集体层次的政治文化。因此, 虽然有区别, 但至少在实证主义范式的政治文化研究中, 政治文化和政治心理有一定的亲缘性。

^① Lowell Dittmer, “Political Culture and Political Symbolism: Toward a Theoretical Synthesis,” *World Politics*, 29(4), 1977, pp.552-583.

^② Doh Chull Shin, *Confucianism and Democratization in East Asi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2; Tianjian Shi, *The Cultural Logic of Politics in Mainland China and Taiwan*,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5.

^③ 胡鹏:《政治文化新论》,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20年, 第21页。

^④ 胡鹏:《政治文化》, 王正绪、唐世平、耿曙主编:《比较政治学》,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21年, 第140页。

^⑤ 政治心理和政治思想往往被认为与政治文化有着密切联系, 甚至被认为属于政治文化的一部分。参见朱日耀:《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结构及其特点》,《政治学研究》1987年第6期, 第43-48、74页。

^⑥ 戴维·P.霍顿:《政治心理学: 情境、个人与案例》, 尹继武、林民旺译, 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13年, 第4页。

^⑦ 王丽萍:《人格与政治: 政治心理学领域核心关系分析》,《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2期, 第15-23页。

^⑧ 戴维·P.霍顿:《政治心理学: 情境、个人与案例》, 第31-33页。

2) 政治思想与政治文化

许多研究将政治文化和政治理论、政治思想相结合,这尤其反映在中国学者的政治文化研究中。佟德志认为,在排除了政治制度后,政治文化的广义概念包括政治心理和政治思想。^①这种观点基本继承了徐大同、王沪宁、王浦劬等前辈学人的看法。^②而辛道辙、史天健等人也从经典文献中发掘传统东亚或中国的文化规范。胡鹏在《政治文化新论》中,则把儒家思想、法家思想、共和主义、自由主义等作为其政治文化理想类型(ideal type)的示例予以呈现。

但是政治思想是有别于政治文化的。首先,传统的思想史研究是精英的思想史,并相对忽视一般民众的日常,^③而政治文化则关系到我们的日常政治生活。必须确定的是,精英阶层产生的政治思想在落实到民众层面时是否会发生变质。思想家会为自己的主张寻找合法性,例如合理的出发点、一贯的逻辑等等,以此论证自己思想的正确性。但当政治思想落实到民众的一般生活中时,民众并不会思考背后的假设与逻辑,更多只会实践其提供的应然准则。换言之,政治思想可能是政治文化的来源,但其内容远比政治文化来得多;至少在民众层面,政治文化可能是政治思想的某种庸俗化版本。也就是说,以《论语》《孟子》《四书章句集注》等实体存在的政治思想更多的是一种客观事实,即便它作为一种经典(canon)被社会集体所接受,但它在落实到政治文化日常的主观方面时也可能发生变质。

其次,政治思想作为一套成体系的论述有时会与其他思想相排斥,但是存在于现实社会中的政治文化往往是不同思想的糅合物。从思想典籍中寻找政治文化可能只适用于单一文化传统的案例。^④这种方法便不适用于日本、韩国这样的案例。日本在历史上一波又一波地接受外来文化,形成了某种重层构造。尽管可以像丸山真男一样从《古事记》《日本书纪》和《万叶集》等古籍中探寻日本思想的古层,^⑤但是古层毕竟不是日本思想的全部。换言之,我们可能无法找到一个连贯的文化传统并从中推导出日本的政治文化。而在韩国的案例中我们可以看到,

^① 佟德志主编:《比较政治文化导论——民主多样性的理论思考》,第14页。

^② 徐大同:《政治文化民族性的几点思考》,《天津师大学报》1998年第4期,第33-40、47页;王沪宁:《比较政治分析》,第159页;王浦劬:《政治学基础》,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241-242页。

^③ 参见葛兆光:《中国思想史》第二版,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3年。特别是其第一卷《思想史的写法》。

^④ 胡鹏:《政治文化新论》,第144页。

^⑤ 丸山真男「歴史意識の「古層」」『忠誠と反逆——転形期日本の精神史的位相』ちくま学芸文庫、1998年、353-423頁。

朱子学虽然依然影响着韩国的文化，但在政治生活中基督教会的影响同样重要，很难仅仅从朱子学中推导出韩国社会的政治文化。

3) 政治文化的位置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到，政治文化与政治心理和政治思想既有关联又有区别。一方面，政治文化在主观方面与政治心理有一定亲缘性，但在“个体—集体”层面上有所区别；另一方面，政治文化在集体方面与政治理论或政治思想有一定关联，但在落实到政治生活的主观方面时又与政治思想相区别。

也就是说，政治文化位于政治思想和政治心理的中间位置（见图1）。从“政治文化—政治思想”的关系来看，政治思想是某种客观存在的思想、学说被集体接受后在主观方面的落实。因此，政治思想位于政治文化的上方。政治文化的许多方面根植于某种或多种政治思想，在很大程度上是这些政治思想的简化和实践版本。例如，“夷夏之辩”的政治思想强调文化要素的区分，但在落实到实践中时却会带上血缘主义的排外色彩。

从“政治文化—政治心理”方面来看，政治文化是政治心理是主观政治心理在集体层面的模式，是对大多数人的政治心理的提炼和归纳。因此政治心理位于政治文化的下方。如果一种政治文化无法得到个体层次政治心理的普遍反映，那么这种政治文化便会遭到质疑。如果我们宣称某国的政治文化是等级制的，但在个体心理层面发现没有国民会按照等级制来思考政治，那么我们无法认为这种等级制政治文化真实存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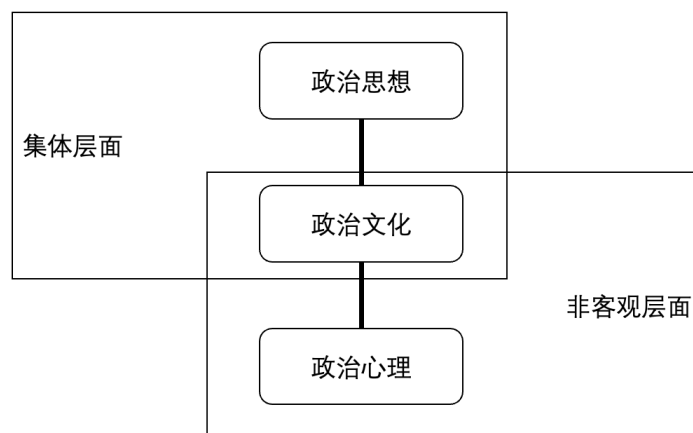


图1 政治文化与政治思想、政治心理的关系

一些学者将政治心理、政治思想甚至政治制度^①等各种要素均纳入政治文化的范畴，这种过分强调联系的做法使得政治文化一度成为非常庞杂的研究领域。但是政治文化作为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必须要做的就是与其他领域区别开。同时，每个研究领域都不可能与其他研究领域完全割裂。就政治文化而言，它与政治思想、政治心理存在交叉之处，但同时又因“政治文化”概念本身的特点与二者区分开。与其将各种议题都称作政治文化，不如区分出各个领域之间的层次。把政治文化理解为政治思想和政治心理的中间位置，也有利于我们重新审视已有的政治文化研究。

三、接近政治文化的三种方式

迈克尔·布林特的著作《政治文化的谱系》向我们展现出三种政治文化研究的传统：法国的社会学传统、德国的文化哲学传统和美国的社会科学传统。^②卢春龙和张华进一步将三种传统概括为社会学取向、诠释学/阐释学取向和行为主义取向。^③事实上，法国的社会学传统和文化哲学传统都可以被认为是解析主义的。^④因而，学界倾向于将实证主义范式和解析主义范式作为政治文化研究的两大范式。^⑤

关于政治文化的两种研究范式，学界已经有了许多研究。胡鹏将学界关于两种范式的区别总结为文化定义、分析层次和单位、分析方法、研究目标四种区别（见表 1）。事实上，通过本文提出的“政治文化作为中间位置”的框架可以看到，两种范式还代表着接近政治文化的两种不同方式。

表 1 政治文化研究的两种范式

	解析主义	实证主义
文化的定义	仪式、符号、话语	个体观念的集合与分布

^① 如朱日耀：《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结构及其特点》；Peter R. Moody, Jr., “Trends in the Study of Chinese Political Culture,” *The China Quarterly*, 139, 1994, pp.731-740.

^② 迈克尔·布林特：《政治文化的谱系》，卢春龙、袁倩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

^③ 卢春龙、张华：《政治文化复兴中的方法论问题》，丛日云主编：《当代西方政治文化复兴》，北京：东方出版社，2018年，第42-51页。

^④ 卢春龙：《政治文化研究的多元历史传统：一个方法论的分析》，《学习与探索》2014年第4期，第45-50页。

^⑤ 卢春龙：《政治文化研究的多元历史传统：一个方法论的分析》；胡鹏：《政治文化》。

分析层次和单位	集体层次	个体层次 ^①
分析方法	深描、民族志	问卷调查、访谈
研究目标	展示文化的多样性	展示文化的规律性

资料来源：胡鹏：《政治文化》，王正绪、唐世平、耿曙主编：《比较政治学》，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21年，第139页。

1、公民文化：上行式政治文化研究

阿尔蒙德和维巴开创的公民文化研究根植于美国社会科学兴起的行为主义传统。^②这种取向的研究是从政治心理出发接近政治文化的。

政治科学中的行为主义来源于对传统政治科学的旧制度主义范式的不满。它强调科学性并排斥规范性，崇尚科学理论和技术，因此行为主义主张抛弃不可观察的对象，集中研究可以观察的个体行为。^③而《公民文化》则将行为主义希望观察的个体行为扩展到了个体心理，在“社会心理的取向”这意义上使用“文化”一词。^④

1) 向上接近政治文化

这种研究首先关注个体对于各种问题的认知。为此，阿尔蒙德和维巴在5个国家（美国、英国、联邦德国、意大利和墨西哥）进行了共约5000次的访谈（每个国家约1000次），从而获得各个国家的全国性截面样本。^⑤访谈关注了个体对于政府、选举、公民义务等各种与政治有关的话题的主观看法。例如全书呈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现在请想一想中央政府。你觉得它的活动，它通过的法律等，对你的日常生活有影响吗？是有很大影响，有一些影响，还是没有影响？”^⑥研究者将各个国家中各种回答的占比进行统计分析，从而形成这一问题上的所谓态度“分布”。研究者发现大多数美国人、英国人和联邦德国人认为中央政府对他们的生活有影响，而墨西哥人则完全相反。于是可以看出，在“中央政府的影响认知”这一维度，不同国家会有不同的分布。正是通过各种问题的调查，《公民

^① 实证主义范式是否完全是个体主义的，本文第二部分已有商榷。

^② 迈克尔·布林特：《政治文化的谱系》，第三编。

^③ 何俊志：《结构、历史与行为：历史制度主义对政治科学的重构》，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78-83页。

^④ 加布里埃尔·A.阿尔蒙德、西德尼·维巴：《公民文化——五个国家的政治态度和民主制度》，第13页。

^⑤ 加布里埃尔·A.阿尔蒙德、西德尼·维巴：《公民文化——五个国家的政治态度和民主制度》，第42页。

^⑥ 加布里埃尔·A.阿尔蒙德、西德尼·维巴：《公民文化——五个国家的政治态度和民主制度》，第48页。

文化》总结出三种政治文化的类型：村民型、臣民型和参与型。

英格尔哈特的政治文化研究也基本遵循这一路径。他主持推动了“世界价值观调查”(World Values Survey), 在世界各国调查该国的价值观分布情况, 通过这种分布来标定政治文化。

可以看到, 自《公民文化》起的实证主义政治文化研究并不直接测定“政治文化”本身, 而是通过政治心理的视角“接近”政治文化。在本文的框架中, 从政治心理到政治文化是一种向上的运动方式。研究者们通过统计分布情况将个体层次的政治心理上升为集体层次的政治文化。

尽管遭到了“个体化谬误”的批评, 但这种上行式政治文化研究几乎是行为主义范式的必然结果。这种范式认为集体层次的所谓政治文化无法测量, 真正可以测量的是个体层次的认知, 自然而然会选择从个体出发测量政治心理的分布, 从而接近“政治文化”本身。阿尔蒙德和维巴坦言, 他们的研究是“微观政治学”的,^①但最终要通过微观的聚集而上升到宏观层面。

2) 上行式政治文化研究与政治思想

从政治心理出发的上行式政治文化研究并不意味着与政治思想是绝缘的。它在两种意义上与西方政治理论产生关联。

首先, 公民文化的研究根植于西方的民主理论。《公民文化》在提出研究问题时就心系民主价值, 它希望探讨的问题就是哪种政治文化有利于民主制度的维系。最后, 《公民文化》得出的结论是越具有公民文化, 民主会越稳固。而在书中的实证部分, 被认为具有公民文化特质且民主稳固的就是英国和美国。已经有批评指出, 案例选择本身就会导致这种结论的产生, 因为英美的民主制度本身就比其他三国更加悠久。^②即便后来英格尔哈特的研究扩展了案例范围, 但在很大程度上依然是在讨论政治文化与民主政治的关系。此外, 也有大量研究探讨民主转型、民主巩固与政治文化的关系。^③《牛津政治行为研究手册》将“政治文化范式”章节安排在“现代化和社会变革部分”, 就集中体现了政治文化与现代性密不可分的关系,^④而现代化的政治很大程度上是被西方的民主理论所塑造的。

^① 加布里埃尔·A.阿尔蒙德、西德尼·维巴:《公民文化——五个国家的政治态度和民主制度》,第42页。

^② Arend Lijphart, “The Structure of Inference,” in Gabriel A. Almond and Sidney Verba, eds., *The Civic Culture Revisited*, Boston and Toronto: 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1980, pp.43-45.

^③ 例如 Doh Chull Shin, *Confucianism and Democratization in East Asia*; 郭定平等:《东亚政治文化与民主转型》,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5年等。

^④ 迪尔特·福克斯:《政治文化范式》,罗伯特·E.戈定主编:《牛津政治行为研究手册》,王浦劬主译,北

因此,《公民文化》不仅是科学的,也是规范的(normative)。

其次,从政治心理出发上升到政治文化的方式收到了西方自由主义思想的影响。公民文化研究计算政治心理的分布的方式是计算比例,且每一个个体观测值的权重是相等的。这背后隐含着政治事务中人人平等的自由主义思想。平等当然是现代政治应当追求的价值和规范(norm),但就科学研究而言,这种平等处理并不一定反映现实(reality),每个人在政治事务中的作用权重是不同的。在这一点上,上行式政治心理研究也受到了政治思想的规范性影响。

2、格尔茨的遗产:下行式政治文化研究

实证主义范式通过向上的方式接近政治文化,而解析主义则从另一个角度来接近政治文化。

1) 向下寻找政治文化

相比于主观性,解析主义对政治文化的集体性着墨更多。解析主义认为上行式的政治文化研究犯下的谬误就在于不够重视集体性,因此他们希望直接从集体层次探寻政治文化。

许多解析主义者从克利福德·格尔茨(Clifford Geertz)的文化定义中汲取灵感。格尔茨把文化定义为纯粹的符号系统,人在这一意义之网上活动。^①在这个意义上,理查德·威尔逊(Richard W. Wilson)指出文化是公共的,提供的是一种情境(context)。^②解析主义同样从法国社会学传统和德国文化哲学传统中获得了帮助。布林特梳理了从孟德斯鸠到托克维尔的法国社会学传统和从歌德到韦伯的德国文化哲学传统,除此之外埃米尔·涂尔干(Emile Durkheim)同样影响了解析主义对政治文化集体性的认识。^③

然而从直接从集体层面入手并不容易,与实证主义范式一样,解析主义同样遇到了现实生活中不存在明文规定的社会规范这一问题。为此解析主义的政治文化研究往往会诉诸被系统阐释过的规范,而这些规范通常已经被编入某种政治思想,成为政治思想的一部分。最明显的就是对东亚政治文化传统的研究,研究者往往会强调儒家思想对于东亚国家(尤其是中国和韩国)政治文化的塑造。^④

京:人民出版社,2018年。

^① Clifford Geertz, *The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s: Selected Essays*, Basic Books, 1973.

^② Richard W. Wilson, "The Many Voices of Political Culture: Assessing Different Approaches," *World Politics*, 52(2), 2000, pp.246-273.

^③ Lucian W. Pye, "Political Culture Revisited," *Political Psychology*, 12(3), 1991, pp.487-508.

^④ 郭定平:《东亚儒家文化与民主转型:一种理论分析框架》,《复旦政治学评论》2009年第八辑,第7-35

胡鹏的新著《政治文化新论》所提供的政治文化变迁逻辑更是印证了这一点。该书指出,政治文化的变迁开始于内在政治危机,在内在危机和外在环境中思想精英创造新的政治思想和理念,并转化为普通民众日常生活中的意义体系,从而改变政治文化。^①也就是说,当我们分析一种新的政治文化时,首先应该探寻思想精英推出的新的政治思想,再由政治思想下降到普通民众也生活在其中的政治文化。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解析主义范式的政治文化研究被称作下行式的。

正是由于需要从政治思想下降到政治文化,所以解析主义的政治文化研究往往会强调精英与大众的区别,在这一点上它区别于《公民文化》。^②罗德明的解析主义政治文化研究区分了精英与大众。在他的符号学政治文化研究中,精英操纵符号,而普通民众解释符号并作出反应。^③在胡鹏看来,不仅在政治文化变迁中精英与大众有所区别,政治文化对二者的政治行为也有不同影响机制:政治文化通过习惯和潜意识塑造民众偏好,而通过理念和价值观影响其对利益的判断。^④

2) 下行式政治文化研究与政治心理

下行式政治文化研究同样会与政治心理产生关联。正如上文所说,政治文化通过习惯和潜意识塑造民众偏好,而民众偏好在个体层面就是一种政治心理。

除此之外,政治心理是下行式政治文化研究不可避免的问题。尽管不能认为一个国家有某种政治文化,这个国家的所有人都会遵循这种政治文化形式行事,这是一种典型的“生态学谬误”。但是,如果从政治思想推导出的政治文化无法在民众的日常政治生活中寻找到一定的模式,那么我们同样无法确认这种政治文化的存在。对于一种政治文化来说,即便不是大多数,也需要有一定数量的民众奉行这种文化。

因此,一些带有解析主义色彩的研究者同样会通过问卷调查等形式确认民众对于特定政治文化的接受程度。史天健的研究典籍出发,识别出了与西方社会契约传统相区别的儒家传统作为中国的规范传统,它的特点是非自我中心的利益界

页; Lucian W. Pye, *The Spirit of Chinese Politics: A Psychocultural Study of the Authority Crisis in Political Development*, Cambridge and Lond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Doh Chull Shin, *Confucianism and Democratization in East Asia*; 丛日云、王志泉、李筠:《传统政治文化与现代政治文明:一项跨文化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

^① 胡鹏:《政治文化新论》,第274页。

^② 阿伦·利普哈特指出,《公民文化》认为公民文化会影响政府精英的回应性,但是却没有讨论精英态度与政治文化的关系。也就是说,在公民文化的调查中没有区分出精英与大众。参见 Arend Lijphart, "The Structure of Inference," pp.49-52。

^③ Lowell Dittmer, "Political Culture and Political Symbolism: Toward a Theoretical Synthesis."

^④ 胡鹏:《政治文化新论》,第235-246页。

定、等级制、避免冲突和实质正义。^①随后，他使用调查数据检验了规范对民众政治心理的影响。^②而丽萨·韦丁（Lisa Wedeen）则主张从符号实践（semiotic practice）的视角进行政治文化研究。^③其中的“实践”使得韦丁的研究和史天健类似，同样带有了实证主义的色彩，可以被视作对两种范式的调和和折衷。

3、小结

以“尊卑有序”为例，简单来说，实证主义的公民文化式政治文化研究通过上行接近政治文化，它希望回答的是有多少人认为应该“尊卑有序”；而解析主义的政治文化研究是下行式的，它希望回答的是这个社会“为何要尊卑有序”和“如何尊卑有序”。（见图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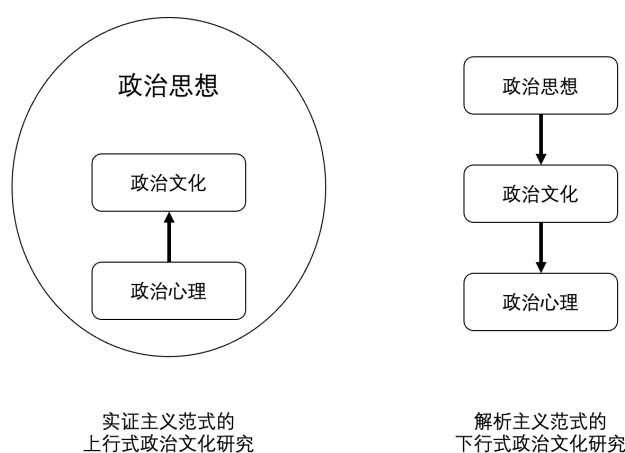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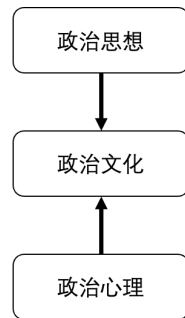
图2 接近政治文化的两种方式

从韦丁和史天健的立场来看，还存在一种折衷主义的方法，它不仅通过整体层面探寻政治文化所提供的意义系统，还通过个体层面的社会调查为政治文化是否真的为大众接受提供经验证据。这种方式从政治思想和政治心理两方面同时向政治文化逼近（见图3）。

^① Tianjian Shi, *The Cultural Logic of Politics in Mainland China and Taiwan*, p.50.

^② Tianjian Shi, *The Cultural Logic of Politics in Mainland China and Taiwan*, Chapter 3-7.

^③ Lisa Wedeen, "Conceptualizing Culture: Possibilities for Political Scienc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96(4), 2002, pp.713-728.



折衷主义范式的
逼近式政治文化研究

图3 折衷主义的政治文化研究

折衷主义直接来自于对实证主义的不满，希望将解析主义带入政治文化研究，但同时不完全成为解析主义的解读。但是折衷主义的原点是解析主义的。它的逻辑是，先通过解析主义的方式识别出若干政治文化规范，再通过实证研究加以检验；而不是先通过实证研究识别出若干政治心理模式分布，再通过回到典籍来寻找这些模式的政治思想来源。

四、结论：政治文化研究的未来

本文首先从公约数的角度梳理了政治文化研究者对“政治文化”概念的共识。第一个共识在于政治文化是政治的非客观方面。尽管解析主义者并不完全认同实证主义者所持的“政治文化是主观因素”的观点，但也会承认政治文化不是一种完全客观的因素。其次，政治文化是集体层面的现象。在这一点上，解析主义者比实证主义者走得更远。

正是在这两个公约数的意义上，政治文化与政治思想、政治心理既有联系又有区别。政治思想位于上方，政治心理位于下方，而政治文化就在政治思想与政治心理的中间位置。

政治文化往往无法被直接观察到，而公认的两种政治文化研究范式就是分别从政治心理和政治思想两方面接近政治文化的方法。实证主义从政治心理出发向上接近政治文化，而解析主义则从政治思想开始向下接近政治文化。除此之外，还存在同时从两方面接近政治文化的折衷范式。

在本文看来,折衷范式其实是接近政治文化的更好方式。一方面,它直接从集体层面出发探讨政治文化,^①避免了实证主义范式可能遇到的“个体化谬误”;另一方面,它通过政治心理层面的实证结果,为集体层面的政治文化提供了经验数据,在测量政治文化的接受程度和接受范围的同时,避免了解析主义范式可能遇到的“生态学谬误”。

同时从两个层面出发,还可以避免解析主义可能犯下的“阐释循环问题”。在理想上,解析主义的政治文化是集体层面的,但由于信息的局限,我们往往需要通过对部分的解读才能拼凑出整体的面貌。于是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因为一些部分的政治文化是A,所以整体的政治文化是A;同时因为整体的政治文化是A,所以部分的政治文化是A。而折衷主义的范式则能够避免这样的同义反复(tautology)。

折衷主义的出发点是解析主义,同时运用实证主义加以补充,也因此遇到了实证主义的困难。实证主义的上行式研究长于对当下截面数据的处理,因此折衷主义也必须获得当下的数据。所以折衷主义虽然能够通过解析主义的方式获得历史上某段时间可能存在政治文化规范,^②但无法获得例如北宋的社会调查数据。然而这种困境同时揭示出政治文化研究未来的可能发展方向。

随着大数据、自然语言处理(NLP)和人工智能(AI)技术的发展,有理由期待通过技术手段可以将地方史志、笔记、民间故事等全部数据化。形成规模庞大的数据库后,可以通过人工智能完成自然语言处理,从而形成类似社会调查的数据库,从而为折衷范式提供可供检验的社会事实,推动政治文化研究进一步走向历史。这样的研究还能够为政治文化的历史变迁提供研究基础。

从解析主义的角度同样可以提出对折衷范式的建议。解析主义往往诉诸古代典籍,但除了政治思想以外,小说、诗歌、电影、电视剧、话剧、音乐剧甚至综艺节目、流行歌曲,都可以成为文化解读的来源。例如猪口孝就利用了小说文本梳理了近世日本以来五个世纪的文化变迁。^③扩展了解析的范围后,解析主义就不必拘泥于经典政治思想,可以从当代思想中挖掘更贴近现实的文化规范,再同时辅以当下的社会调查数据作为经验支撑,同样能丰富现有的政治文化研究。

^① 即便是从政治思想下降,但毕竟仍是集体层面的。

^② 目前国内对于我国先秦至民国的历朝历代以及当代中国都进行了政治文化的研究。而对于古代部分,相关成果往往是历史学界做出的,在范式上更加接近解析主义。

^③ 猪口孝:《日本文化变迁与民主发展:经验与反思》,《复旦政治学评论》2009年第八辑,第166-180页。